

港台地区当代翻译家群体翻译思想中的 语文情结^{*}

金其斌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 广东深圳 518055)

摘 要: 本研究选取余光中等十位港台地区当代翻译家作为研究对象, 探析该群体翻译思想的共性。研究认为, 根植于该群体卓绝超迈的语言和文字天分, 他们的翻译思想语文情结浓厚, 表现在译文中的文白结合、对当今语文退化的忧思、对译文体的口诛笔伐、重实践、轻理论的翻译主张等多个方面。此外, 在他们看来, 翻译还起着延续译者的写作生命, 传播人类文明的作用。为了完成这一文化使命, 该群体殚精竭虑, 推出了一批优秀的译作, 为年轻的译者树立了楷模。

关键词: 当代港台地区翻译家; 翻译思想; 语文情结

DOI:10.13458/j.cnki.flatt.004381

中图分类号: H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17)04-0108-12

1. 引言

近年来, 随着翻译研究的转向, 译者不再隐形, 翻译家研究也随之逐渐升温, 并呈现出新的流变趋势。国内的翻译家研究开始关注某一个类别的翻译家或者某个区域的翻译家并进行集体研究(张汨文军, 2014: 100)。周领顺和彭秀银(2014: 104)认为, 按照地域划分开展专题的翻译家研究, 是我国学者挖掘地方并更好地服务于地方的一个重要举措, 这一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尚不多见。可见, 这类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 福建翻译家、浙江翻译家研究^①均有相关学者(林本椿, 2004; 陈秀, 2007; 温中兰, 2010)涉猎, 周领顺和彭秀银(2014)、(2016)以及孙晓星(2015)的苏籍翻译家研究也不断有成果发表。受研究视野及文献获取困难等诸多因素所限, 对港台地区当代翻译家群体的研究尚告阙如。

当我们把研究视野聚焦港台地区翻译家这一群体时, 每个人身上都折射出多重光环。横跨文化界和电影界, 对文学批评、翻译和《红楼梦》研究均有涉猎的林以亮(本名宋淇), 双语俱佳(尤以美语研究著称)、“一言难尽”(其才)的乔志高(本名高克毅), 诗作成为香港中学会考中国语文课范文的黄国彬, 香江第一才子陶杰, 有“科学家、文学家、工程师”三种身份、台湾元智大学“桂冠文学家”奖首届得主陈之藩, 在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四度空间”中游走、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余光中, “香港散文五大家”中的董桥、刘绍铭, 荣获“英帝国官佐”勋衔的翻译“推广家”金圣华, 自修成才的散文家、翻译家思果(本名蔡濯堂), 细观之下, 散文和翻译堪称他们文学成就上的双璧, 交相辉映, 光彩熠熠。值得注意的是, 他们身上的文人特质使该群体的翻译思想表现出浓厚的语文情结。周领顺和彭秀银(2014:

^{*} 基金项目: 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港台地区当代翻译家群体翻译思想研究”(项目编号: GD13XW06)的阶段性成果; 同时受2013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翻译教师教学能力研究: 结构、现状、发展”(项目编号: 13XJC880003)资助。

作者简介: 金其斌, 教授, 硕士, 研究方向: 翻译理论与实践, 双语词典研究。作者邮箱: knight3509@163.com

101) 指出,译者群体行为研究,旨在寻求作为一个群体的译者其总的行为特征。语文情结可以说是港台地区翻译家群体身上最鲜明的总体特征之一。

港台地区翻译家的“语文情结”指该群体对简洁典雅的译文和文学经典译介的痴迷和不懈追求,可分为语言文字(即“器”)和文学诉求(即“道”)两个层面。语言文字层面,港台地区翻译家提出了以纯正中文为旨归的翻译主张:文白兼济、活色生香的译笔,对语言生态恶化的忧思,视译文体为字虱的文字洁癖,推崇经典译本的研读、不唯理论是尚的翻译思想,都是这一层面的具体体现;文学层面而言,一方面,翻译是译者写作生命的延续,寄托着译者的文学梦想;另一方面,翻译还起着传播文学经典,传承人类文明的作用。在这种文化使命的感召下,港台地区翻译家群体孜孜矻矻,勤于译事,为译界做出了表率。

2. 语文情结孕育的土壤:港台地区翻译家扎实的双语素养

打铁还需自身硬,该群体深厚的语言功底是其语文情结得以产生的先决条件。

很多港台地区翻译家将双语能力作为译者的必备条件。林语堂(1990: 33)翻译标准之三方面就明确提到了“第一,译者对原文方面的问题,第二,译者对中文方面的问题”;林以亮(1990: 85)指出一个翻译者所应具有的条件是“(一)对原作的把握;(二)对本国文字的操纵能力”;原台湾大学外文系主任英千里更是认为,翻译是没有什么诀窍的,把要翻的两种文字弄通就是了(刘绍铭,1999: 20)。董桥(2000a: 41-42)也持此论:翻译要成“家”,最要紧是本身要有文人气质,血管里淌着文字。余光中强调,成就一位称职的译者,该有三个条件:首先当然是对于“施语”(source language)的体贴入微……同样必要的,是对于“受语”(target language)的运用自如(郭虹,2010: 58)。乔志高(2000: 173)同样提出,翻译工作的最低限度,文学翻译的“底线”,只有两个要素:第一,要领会原文的语言,第二,要掌握译文的语言。

港台地区翻译家群体作为译界的斫轮老手,语言造诣深厚,完全满足上述条件。

董桥(2012: 104-105)称思果“他的中文和英文实在好,比名门高徒还要好。初识那年他是《读者文摘》中文版编辑,……那是中文《文摘》珠玑字字的年代,香港台湾地区湾年轻一代读书界深受沐恩。蔡先生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布道似的传布文字的品德”。

含“英”咀“华”(黄子平,2012: vii)的刘绍铭从小浸淫于中国传统文学,台大外文系毕业,后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英文修养极深。姜梦诗(2014)称其“双轨并行”。

以研究美国英语而著称、中英文可以左右开弓的乔志高在圈内更是口碑极佳。董桥(2012: 123)赞其“中文和英文跟他的言谈一样舒坦一样悠闲,不失端庄也不失轻灵”;金圣华(2010: 266)也称其为“有求必应,乐于普度众生”的“活字典”。

不但精通英文,还精通法、德、西、意四种欧洲语文和希腊文、拉丁文的黄国彬,环顾宇内,罕有其匹。怪不得思果(2002: 172)感叹“他做翻译,别人无法跟他比。”

有了这样的双语甚至多语功底,翻译起来自然驾轻就熟,胜任愉快,对译文提出严苛的要求也就再正常不过了。

3. 语文情结的语言文字层面

语言文字层面可以视为语文情结“器”的层面,这一环节更强调翻译过程中对语言本体的关注。

3.1 港台地区翻译家论“文白之争”

关于译文中文言和白话的使用,港台地区翻译家群体都强调文言的功用。余光中提出了“白以为常、文以应变”的翻译主张:

在白话文的译文里,正如在白话文的创作里一样,遇到紧张关头,需要非常句法、压缩字词、工整对仗等等,则用文言来加强、扭紧、调配,当更具功效。这种白以为常、文以应变的综合语法,我自己在诗和散文的创作里,行之已久,而在翻译时也随机运用,以求逼近原文之老练浑成。(余光中 2002: 190) 因此,他非常推崇钱锺书著述中引用西文时的译笔:其实无论在《谈艺录》或《管锥篇》里,作者在引述西文时,往往用文言撮要意译;由于他西学国学并皆深邃,所以译来去芜存菁,不黏不脱,非仅曲传原味,即译文本身亦可独立欣赏,足称妙手转化(adaptation),匠心重营(recreation)。(余光中 2002: 189)

余光中身体力行自己的这一主张。法国文豪伏尔泰的名言“The best is the enemy of the good”译成“最佳容不得尚佳”、“上佳是次佳的敌人”,余光中(2012: 59)认为都还不到位,改成“至善者,善之敌也”,才是“精益求精”的本意,文言出现在白话的上下文里,始成立体。董桥(1996: 115)也指出,“中文唯一的传统根基,还是文言文,或者说古文旧诗词,……提倡白话文是正途;不过,置传统文言文根基于不顾,白话文结果就更无法度可言了。”恪守这一信念,董桥的译笔熠熠生辉。入境事务处的公文“Caution: This certificate is a valuable document which must be carefully preserved as formal evidence of citizenship and it will not as a rule be possible for a duplicate to be issued if it is lost”,官方译文“此乃重要文件,持有人应小心保存,作为英籍人士的正式证明。按照本处惯例,如有遗失,将不另补发”,拖沓冗长,繁复臃肿。董桥(2000b: 122)改译为“本证明书系归化英籍之正式证明要件,应予妥存,遗失概不补发”,自称“简洁明了得很”。两相对照,原译40字,断句五处,董译26字,停顿两次,董译以少胜多,以简驭繁,再次彰显了文言简洁有力的特点。

董桥利用文言锻句炼字的功夫,学界服膺者不少。安东尼·鲍威尔(Anthony Powell)的妙语“Growing old is like being increasingly penalized for a crime you haven't committed”,董桥译成“年事愈高愈像清白之身而受无妄之罪”。把“a crime you haven't committed”消化成“清白之身”,刘绍铭(2006: 92)誉为“真乃神来之笔”。

“The New York restaurant business is in trouble. No one dines anymore. They just eat”董桥译为“纽约饮食业前景堪虞,盖昔日用膳之情调荡然无存,人人但求果腹耳。”李小均(2003: 9)点评道“怀旧的温馨情调与萧条的凄凉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字的典雅与所指的寒碜构成了奇妙的张力”。

年轻学者则把文言和白话放在西方的学术视野下予以检讨。香港中文大学董元方(2009: 230)利用库恩的范式学说,指出文言和白话为两个传统,各自有常态的进展和异象的纷呈。刘绍铭(2009)也认为,文言和白话本身并不是两个水火不兼容的语体,文白的结

合 柳暗花明,自有一番新气象。然而,随着文言的式微,汉语的文采江河日下。表现手法日益贫乏,已是不争的事实。

3.2 港台地区翻译家对文字的敏感及语文退化的忧思

昔日文学的光彩,只留下斑斑的余辉。文学的枯萎、语文的退化,港台地区翻译家群体念兹在兹。董桥(2000:88)以他惯有的笔触感叹道“文字该也是肉做的。现代文明世界渐渐淡忘文字的这一层功能,总是想把文字凝固成钢铁、成塑胶,镶进冷冰冰的软硬件之中。”

陈之藩直斥当下的文字“词汇贫乏,作风苍白”:

比如他(指陈之藩)说现在的中国人“不仅天塌地裂不会名状,就是伤春悲秋也不会形容。”他小时候已经没有了私塾,所以对中国古典文学只是自发地阅读,但他在阅读中看到了中国文字或者说中国文言文的高贵。你看,中国文字到了白话文时代以后,词汇很贫乏,作风很苍白,废话越来越多。(董元方 刘忆斯 2012)

陶杰(2012:320-321)则将下面的文字“顷接来函,展读长思,怅不自胜。云天阔别,悠悠七载,忆英伦俦侣,共游泰晤士畔,晨读海德公园,暮游大英博物馆,同窗情谊,乐何如之”称为“华文的集体回忆”,是“刘半农和林徽音年代的文字”。古德明(2013:57-58)甚至发出了“中文已丧”的哀叹:中文“享”字,向来是说受用美好事物,例如东汉重臣梁商临终说“吾以不德,享受多福。”(《后汉书》卷三十四)宋朝《枫窗小牋》卷下谈到天下难测,小人往往“乐享寿考,妻儿满前”……但现代汉语所谓“分享”,其实和中文的“享”字无关,只是英文“share”的变体。share本可译做“共有”“分有”“分担”“分享”“述说”等等,例如to share the expenses(分担费用)、to share the back seat(同坐后面的座位)、to share a secret with someone(把秘密告诉人家)。但现代汉语统统译做“分享”。……沧海横流,中文已丧。呜呼哀哉,尚“享”。

111

港台地区翻译家对文字的敏感,还表现在对人名地名音译用字的选用上。通过以下几组音译词(前者为港台地区译家推荐或使用的译名,后者为内地通用译名):Cate Blanchett(白兰雪/布兰切特)、Michelle(米雪儿/米歇尔)、Rachel(蕊秋/蕾切尔),港台地区译名让我们领略了汉字的流光溢彩和摇曳风姿,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字的柔软和尊严。陶杰、乔志高、迈克、黄维樑等港台地区学者对译名的“怀旧情结”(金其斌 2010:69-70;2013:79-80;2014:56-57)即是这种“音译洁癖症”的典型“症状”。

港台地区翻译家为语文的蜕变敲响了警钟,而劣质译文的兴风作浪则使本已不平静的文字港湾黑云乱翻,木铎失声,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几乎要把曾经优雅的中文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

3.3 港台地区学者眼中的“译文体”

译文的“恶性西化”而导致的“译文体”泛滥,港台地区翻译家历来口诛笔伐(金其斌,2012:67-70)。译文体遗毒之广,连诗坛巨擘、散文重镇徐志摩和梁实秋都未能幸免。

徐志摩将“He was in the middle of his breakfast”译成“他正在吃他的早饭”^②,宋淇讥其“可笑”,“不是中文”(林以亮,1990:98);写出了“‘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

悄然!”这样静谧洗练文字的梁实秋在翻译时,照样让原文牵着鼻子走,“pure, bracing ventilation”成了“纯洁兴奋的空气”。刘绍铭(2009)慨叹,雅舍主人如果不“搞”翻译,空气只会“清新”,不会“兴奋”。

饶有趣味的是,把这种奉源语为神明,牵强生硬的翻译体比作遭源语强奸的不乏其人。董桥(1996: 239)也持此说:“好的翻译,是男欢女爱,如鱼得水,一拍即合。读起来像中文,像人话,顺极了。坏的翻译,是同床异梦,人家无动于衷,自己欲罢不能,最后只好“进行强奸”,读起来像鬼话,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古德明(2013: 205)在提到“CEO”的翻译时,也阐明这样的观点。

“从前,香港把CEO称为“行政总裁”,很不错;台湾地区拾日本涕唾,译做“执行长”,差了一截;但大陆地区硬译的“首席执行官”一出,港、台两地现代汉语人就争相仿效。

大陆地区学人司空见惯的“被”字,让港台地区译家如芒在背,董桥、黄文范避之唯恐不及:

我做翻译的那些年案头常年供奉韩迪厚和思果的翻译论著,“当”字“被”字“地”字时刻视为禁忌,深恐错手一用,两位前辈鼻孔朝天嗤笑一声“这是人话吗?”(董桥 2012: 105-106)“我曾倡议在二十一世纪来临前,为中文‘除三害’,把一些文字内穷斯滥矣的西化‘是’、‘被’、‘们’痛痛快快砍掉,‘戴安娜是死了’(Diana is dead)的‘是’,便是一例。”(黄文范 2003: 69)劣币驱除良币,“被”字横行肆虐。金圣华(1997: 42)慨叹:“由、让、给、挨、遭、受”,都去哪儿了?

大加伐撻之余,港台地区翻译家一直把让中文免受译文体的侵害和污染视为自身的职责所在。金圣华(2014: 3)倡议,作为翻译的推广者,要让人人都知道,翻译之道不但与外语的顺畅,更与中文的纯净息息相关。余光中(2014: 178, 148)把译文体列为文言文、白话文和旧小说文体之外的第四文体的同时,也强调翻译教师对于维护健康美丽的中文,负有重大责任。因此,对“译文体”围追堵截,穷追猛打的同时,发现好的中文译本,港台地区译家则如获至宝,推崇备至。

姚克翻译的《推销员之死》,董桥和思果都是赞不绝口。董桥承担过该书的编校工作,在回忆这段经历及纪念原作者米勒的文字中,董桥多次提到姚克的译笔:

“当时我还逐句对过姚克先生译的《推销员之死》,至今受用。”(董桥 2000a: 42)

“看到 horizon 一字,我不禁想起姚克先生。当年我和戴天编校姚先生翻译的《推销员之死》,姚先生把这个字译为“天涯”,我们拍案叫绝! 那部译文是翻译的典范,姚先生成了小戴和我的敬爱的翻译老师。”(董桥 2000d: 153)

“我六十年代末在美国新闻处丛书部初会《推销员之死》,逐句对读米勒的原文和姚克的译文,逐句校读中文本的校样和姚先生的序文。米勒的文字清朗而动人,姚先生的译文恰巧是米勒文采的倒影。赶完那本书,我不敢再乱做翻译也不敢再乱写文章: 文章太难了。”(董桥 2005: 81-82)

比较姚克译本和大陆译本第一幕开笔和剧本收尾一句的译文后,董桥更是感叹:

姚先生中学西学修养饱满,出手漂亮,字字都掂量过,套戴天一句口头禅“绝不跟你

开玩笑的”！(董桥 2005:92)

思果在对姚克译本的评注中,更是通过大量译例的剖析,做出了精当的点评:

表1 《推销员之死》姚克译本思果点评赏析

序号	《推销员之死》原文	姚克译文	思果点评
1	I am the New Englandman. I am vital in New England.	我是跑新英格兰的。在新英格兰我可吃得开。	用“跑”真巧妙。下面说他在那里“吃得开”用来译 vital 可称神来之笔。姚先生从来不死译。(思果 2004: 14)
2	You're my foundation and support, Linda.	要是没有你,我在哪儿扎根儿? 我靠谁撑腰?	“扎根儿”全句用来译 You're my foundation and support, Linda, 真是才人之笔,改写得天衣无缝。我真想不出谁能译得这样巧妙。我猜姚先生信手可以译来,也许他改了又改。就凭这句,他赢得我五体投地。(思果 2004: 29)
3	What a sensation!	这可不够瞧老大半天的!	译成“这是多么轰动的事啊!”就完全是死的外国话了。真亏姚先生用另外的外国话译出来。不要看轻这一句,如果能够这样消化原文,翻译的窍门全传达出来了。这已经踏进艺术的境界,不是译学所能讲授的。(思果 2004: 80)

“神来之笔”、“才人之笔”、“天衣无缝”与董桥对姚译的激赏遥相呼应,给只知搬字过纸、死译硬译、“不像人(中国人)说的话”的译文体当头棒喝,也与那些食洋不化、囫圇吞枣,只知贩卖理论的二道贩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4 重实践、轻理论的翻译观

与大陆学人唯西方翻译理论马首是瞻,趋之若鹜的热闹场景不同,港台地区翻译家群体对翻译理论表现出了足够的冷静。董桥就多次提及,研读汤新楣、姚克等人的译本,比翻译课更能受益:

“我不相信翻译可以归为理论,我只相信翻译是又翻又译的工作,做过数十万字以后,自然生巧。……我早在今日世界出版社当编辑,常常逐句校读他(指汤新楣)译的美国小说,得益比上了四年翻译课还大。”(董桥 2000a: 41)

“书中好多好多动人的段落和对白,读原文流泪,读译文再流一次泪:米勒的文笔回肠荡气,姚先生的译笔荡气回肠,编校完这本书,我等于上了两年大学翻译课。”(董桥 2008: 375) 刘绍铭(2014)坦言,初级的翻译是可以教授的,高级的翻译则靠自己领悟。当谈到翻译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时,刘绍铭(2014)指出,研究翻译理论的人往往欠缺了实务经验。像葛浩文把莫言的作品译得那么漂亮,这种功夫是任何翻译理论都不能概括的^③。持同一观点的还有林以亮。他同样“一向不主张偏重理论,因为不相信只凭理论就可以使人成为好的翻译家。”(林以亮,1976: 10) 黄维樑(2014: 65)把这一时期称为自己的“前理论”时期。他指出,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学与翻译相关的四大前辈宋淇、蔡思果、高克毅、余光中,他们对翻译的各种高见是有的,却都没有什么“掷地有声”的、可和今天学院派争一日之长的翻译理论;曾主政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的黄国彬对晦涩空洞、术语深奥的翻译论文甚至“甚感讨厌”(黄维樑 2014: 64-65)。

当然,港台地区译家对翻译理论不盲从,不迷信的态度并不是说他们对翻译没有自己的见解。以余光中为例,他提出的“要译原意,不要译原文”(1998: 2)、“白以为常、文以应变”

(2002: 190) 等主张都是译者多年翻译实践的总结与提炼,在译界影响深远。思果则在《翻译研究》一书中提出了一套以纯正中文为骨干的翻译观,并把它贯穿中国语文各层次,启迪翻译后学,沾溉中文译坛(张宇杰,2011: 104)。港台地区翻译家的部分研究甚至已经初显问题意识。李德超(2013: 13-14)认为,刘绍铭探讨中国的话本小说和唐传奇的英译研究是描写翻译学结合中国语境的先声,而刘靖之的研究已经开始自我反省中国译论传统。

港台地区翻译家这些“从翻译实践与翻译批评里宣示出来的翻译主张”(罗新璋,2013: 4),正是构成有别于西方译论的中国翻译理论的基础。他们的翻译观中,文学的译介,文明的传承更是一个躲不开的命题,这就上升到了该群体语文情结的第二个层面——文学层面。

4. 语文情结的文学层面

文学层面是港台地区翻译家群体语文情结在语言层面的延伸,可称之为“道”的层面,重心在译者的文学追求和译作所发挥的社会功能。

4.1 翻译作为译者写作生命的延续

译书如择友,不可不慎(金圣华,1997: 31)。在港台地区翻译家眼里,翻译是译者写作生命的延续,是译者文学理念和内心情感的载体。

“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里”,一语道破了译者通过翻译,阐发自己文学主张的玄机:

我从事翻译最主要的动机就是我认为“A translator lives a borrowed life”(译者活在借来的生命里)。比方说,我很想写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的作品,但是我没有那种天分,写不出来,怎么办?于是就借着翻译他的作品来表达自己的内心深处想要表达的。我有好几个翻译作品都是借来的生命的表现。其中之一就是伯纳德·马拉默德的《伙计》……《一九八四》也是我借来的生命。(刘绍铭,2014)

陈之藩译诗的缘起与此有着惊人的相似。陈之藩对新诗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必须把我的看法做出来给他们看……(新诗)在意境上与中国传统相连,那非是诗人不可,我是办不到了”(陈之藩,2009: 7)。力有所未逮,退而求其次,“也许可以把英诗翻译成徐志摩式的白话诗”(陈之藩,2009: 8)。于是,从朗费罗、丁尼生到雪莱、济慈,一发不可收拾,译者在“借来的生命里”探寻着自己的文学之梦。

4.2 港台地区翻译家眼中文学翻译的社会功能

在港台地区翻译家看来,翻译还起着经世济用、文化启蒙、传播文明的作用。以余光中为例,其译作始终不脱“学者之译”的本色。所谓“学者之译”,译者必然在翻译时,以传播文化、译介名著为己任(金圣华,2004: 341)。这一点在余氏译作的序跋及译注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余光中在《梵谷传》书后,把书中提到的艺术家的简历一一列表附上,自称“做得比翻译多一点”(金圣华,2002: 121)。这多出来的一点,正是对艺术的提倡,对文化的传播。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余氏在《老人与大海》和《梵谷传》中煞费苦心地为原著指谬,而王尔德喜剧系列的译序和译跋,足以单独结集,成为王尔德研究的珍贵资料(金圣华,2004: 342-343)。

林以亮(2001: 72-73)则在引用纪德的话“每一位优秀的作家都应该至少为祖国译一册优秀的文学作品”^④后指出:我本人大部分时间花在编辑翻译书刊上,唯盼退休后仍有精力

译一部名著或有益世道人心的作品。希望其他学者作家为了国家文化发展前途,在教研创作之余做出一点牺牲,响应纪德的呼吁。刘绍铭同样借老师夏济安之口,道出了翻译的“功用”:他(夏济安)跟我说,书是一辈子也念不完的,但像卡夫卡的《审判》、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一九八四》^⑤这一类书,“我们读书人有责任阅读和传播”。(刘绍铭,2014)

刘绍铭、余光中等名家的翻译为“读书人有责任阅读和传播”(经典作品)做了再恰当不过的诠释。

刘绍铭翻译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就是为了让经典能有个中文译本藏诸名山,传之其人:我通宵翻阅,对夏志清先生许多自成一家的看法,佩服极了。当时想到,这样一本著作,若有中文译本,必会石破天惊。中国学者用外文写的研究中国学术的著作,早晚都应该有个中文本藏诸名山的。不是自己动手,就应由晚辈代劳。(刘绍铭,2001: vii) 余光中翻译王尔德的《不可儿戏》同样抱着“悠然心会,说与君听”的心理:终于有一天,我认为常任这么一本绝妙好书锁在原文里面,中文的读者将永无分享的机会,真的是“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要说与君听,只有动手翻译。(余光中,1998: 2)

4.3 港台地区翻译家群体:译事楷模

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决定了译者的翻译态度,也为年轻的译者树立了楷模。黄国彬翻译《哈姆雷特》、宋淇翻译《兴仁岭重临记》、思果翻译《西泰子来华记》、余光中翻译《梵谷传》和《不可儿戏》,都下足了功夫。

哈姆雷特全剧中首次亮相抛出的双关语 sun/son(Not so much, my lord, I am too much in the “sun”)据黄维樑(2013: 62-65)透露,译者黄国彬直到校对书稿的清样时,还在改动。115
在“译者前言”部分,黄国彬(2013: 111-115)用了足足五页的篇幅来探讨这一双关语的翻译。怪不得黄维樑(2013: 62)发出“一名之立,严复往往要‘旬月踟蹰’,国彬兄可能是经年萦回”的感慨。

宋淇曾翻译英国作家瓦欧的《兴仁岭重临记》(*Brideshead Revisited*),但只完成该书的第三章。译者序道出了宋淇的苦衷:“本章虽然不到一万三千字,而我却整整译了一个多月,看见别人信手译书,只能埋怨自己不济。”(宋以朗,2014: 62)这与部分译者“浮渣式”翻译和“闪电式”出版(蓝洱海,200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为了还原《西泰子来华记》一书中利玛窦十六样贡品在明朝时的称谓和所使用的量词,找到《为心灵点灯》一书中佛陀的原话,思果(2001: 119-121; 2002: 159-160)特地向思高《圣经》学会的神父和圣严法师的弟子果元法师求证原文和原话。译者自己也俨然成了潜心修行的苦行僧,跋山涉水,艰难前行。

余光中翻译《梵谷传》,更是进入了一种忘我痴狂的境界。“凡高附灵在我的身上,成了我的‘第二自己’(alter ego)”(余光中,1997: 487)。翻译《不可儿戏》,更是“全家总动员”:“王尔德写得眉飞色舞,我也译得眉开眼笑,有时更笑出声来,达于书房之外。家人问我笑什么,我如此这般地口译一篇,于是全家都笑了起来”(余光中,1997: 488)。

林以亮(1976: 2)断言,译者如果对原作没有一股虔诚的心情,根本译不好或不必译。功

夫不负有心人,港台地区翻译家对翻译的这种“虔诚”也确保了译本的经典地位。

乔志高翻译的《大亨小传》,就受到白先勇、夏志清、董桥等名家的激赏。

乔志高英译中的那几部美国文学名著:费兹杰罗的《大亨小传》、伍尔夫的《天使,望故乡》以及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迢迢》,译笔之精确流畅,每部都可以用作翻译课上的范本。(白先勇 2008: 12)

《大亨小传》的译笔这样忠实流利,不仅因为高先生中英文底子好,而且是因为他对美国情形这样内行,不可能把原文的任何一点误解。(夏志清 2002: 169 - 170)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在香港美国新闻处做事的时候乔志高先生在美国替美新处翻译费兹杰罗的《大亨小传》。……英文的神采精髓都融入中文的冰肌玉肤,真是一袭考究的天衣。(董桥 2009: 29)

余光中翻译的《梵谷传》和《不可儿戏》同样声名远播。思果(2002: 173)称,看了《梵谷传》,“只有佩服的份儿”;余光中翻译王尔德的《不可儿戏》,更是“逸兴遄飞之作”(林以亮, 2001: 序)

黄国彬(1996: 51, 52)对思果翻译的《大卫·考勃菲尔》同样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以他最近完成的《大卫·考勃菲尔》(*David Copperfield*)的中译为例,译本中的叙事、写情、对话无一不精……就准确程度而言,林纾之于思果,犹业余球员之于贝利和马拉多纳,简直不能相比。思果译狄更斯,就像卞之琳译莎士比亚,霍克斯译曹雪芹,已经超越同一作品的其他译者。

5. 结语

才情高华、灿若群星的港台地区翻译家群体,手执撒豆成兵的文字魔杖,著述之余,旁涉译坛。文学创作和翻译的双重身份、对多种语言的娴熟掌握,为该群体翻译思想中的语文情结提供了孕育的土壤。这一情结在语言文字和文学两个层面破土而出,枝繁叶茂。以前者而论,对译文中文白结合的鼓与呼,对语文生态遭到破坏的忧与思,对“译文体”肆虐的悲与怒,对研读经典译本的迷与痴,看似琐碎却切中肯綮,为劣质译文开出了治病良方;就后者而言,港台地区翻译家强调翻译对社会品格的塑造,对民族精神的提升,呼唤名作名译的涌现。港台地区翻译家的语文情结在“器”与“道”两个层面并行不悖,直击当前译界乱象的要害。在翻译快餐化大行其道的当下,港台地区翻译家群体的翻译思想更显弥足珍贵,留给我们很多启发。

注释:

①类似研究还包括吴文化译者群体和皖籍人士的翻译出版研究。修文乔(2014: 22 - 23)在对鸳鸯蝴蝶派译者群体进行考察时指出,这一作家兼译者群体在籍贯上都来自江浙一带特别是江苏的苏锡常地区,这一生于吴地,长于吴地的文人群体,分享同样的地缘文化,有着相近的文人传统,与吴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关系;张瑞娥(2014)重点关注近百年来皖籍人士的翻译出版活动(如皖籍官员上疏朝廷呼吁“设局译刻西洋实用书籍”、创设报刊、经营译书机构等)。

②余光中(2008: 411)提到译者把英文文法照单全收,“Hold up your hands”(举起手来)成了“举起你的手

来”。这与徐志摩的“他正在吃他的早饭”如出一辙。

- ③葛浩文在接受采访时,自己也承认翻译理论对他的翻译实践直接的好处和影响真的不多。参见孟祥春(2014:47)。
- 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响应纪德的这一号召,积极译介这位法国文坛巨匠作品的中国译者,却迫于建国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等政治形势的压力,承认翻译他的书是“错误”,是“犯罪”:“我在一九三〇年以前(一九二七?)译过纪德的‘窄门’,还有‘牧人交响曲’。这在一九三〇年以后,我承认是错误,现在想起来,译那样的书,简直是犯罪。现在想起来,‘窄门’的翻译是代表着我的思想中黑暗面发展到最高度的一个时期。如果问我在翻译工作上有没有过犯罪的行为,有的:翻译‘窄门’一系列作品,就是犯罪。”(穆木天,1952:6-7)当然,时过境迁,今天的国内译者对翻译优秀的文学作品有着深刻的体认。杨武能(刘荣跃,2014:66)指出,翻译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为自己的读者提供精神养料,如何为丰富自己民族的文学、文化宝库有一点儿贡献;因此,他十分赞赏胡适“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的主张,只译有恒久价值的文学经典(熊辉,2014:47)。曹明伦(2014:117)宣称,自己翻译的目的就是要“为本民族读者奉献读之有益的译作,为本民族作家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本”。冯骥才(2011)在评价草婴时更是对中国翻译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原来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近百年来,翻译家们不常常是中国思想史的主角吗?
- ⑤李辉(2015)在评价翻译了《一九八四》的董乐山时,认为“他把翻译的选择,作为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历史责任的方式……将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当代中国所发挥的独特作用表现得美丽无比”。这与夏志清“我们读书人有责任阅读和传播”可谓一脉相承。翻译的文化使命,壮矣哉。

参考文献:

- [1]白先勇.2008.怀念乔志高先生[A].乔志高编.美语录第三集:自言自语[C].台北:九歌出版社.
- [2]曹明伦.2014.再谈翻译的文本目的和非文本目的——吉狄马加《我,雪豹》英文版序译后[J].中国翻译(5):117-119.
- [3]陈秀.2007.浙江省译家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 [4]陈之藩.2009.蔚蓝的天·旅美小简[M].合肥:黄山书社.
- [5]董桥.1996.董桥文录[M].陈子善编.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
- [6]董桥.2000a.给自己的笔进补[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 [7]董桥.2000b.锻句炼字是礼貌[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 [8]董桥.2000c.天气是文字的颜色[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 [9]董桥.2000d.酒肉岁月太匆匆[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
- [10]董桥.2005.记忆的脚注[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11]董桥.2008.董桥文集1(没有童谣的年代,保住那一发青山)[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12]董桥.2009.青玉案[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 [13]董桥.2012.旧日红[M].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 [14]冯骥才.2011.草婴先生瘦小的重[N].光明日报,2011-09-01.
- [15]古德明.2013.中华正声[M].香港:次文化有限公司.
- [16]郭虹.2010.拥有四度空间的学者——余光中先生访谈录[J].文艺研究(2):47-59.
- [17]黄国彬.1996.翻译途径[M].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
- [18]黄国彬.2013.解读《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原著汉译及详注(上)[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 [19]黄维樑. 2013. 在黄国彬译海上奇幻漂流: 黄译《哈姆雷特》漫读后记[J]. 东方翻译 (2): 61-65.
- [20]黄维樑. 2014. 文情复杂, 翻译不忠——从谢天振《隐身与现身》说起[J]. 东方翻译 (5): 63-67.
- [21]黄文范. 2003. 效顰五十年[M]. 台北: 三民书局.
- [22]黄子平. 2012. 序[A]. 刘绍铭. 蓝天做镜[C]. 香港: 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
- [23]姜梦诗. 2014. 刘绍铭: 译·文人生[N]. 晶报 2014-09-14.
- [24]金其斌. 2010. 名家笔下的音译浅说[J]. 东方翻译 (6): 68-71.
- [25]金其斌. 2012. “译文体”经眼录——港台地区学者“译文体”研究述略[J]. 当代外语研究 (11): 67-70.
- [26]金其斌. 2013. 汉语音译用字的雅趣再探——《名家笔下的音译浅说》补遗[J]. 东方翻译 (1): 79-82.
- [27]金其斌. 2014. 译音无文, 行而不远——三谈音译之趣[J]. 东方翻译 (4): 56-60.
- [28]金圣华. 1997. 桥畔译谈: 翻译散论八十篇[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传播公司.
- [29]金圣华. 2002. 认识翻译真面目[M].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 [30]金圣华. 2004. 三“者”合一的翻译家——余光中[A]. 林本椿编. 福建翻译家研究[C].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 [31]金圣华. 2010. 友缘·有缘[M]. 香港: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 [32]金圣华. 2014. 桥畔译谈新编[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33]蓝洱海. 2005. 翻译文学不能承受劣译之害[N]. 中国文化报 2005-04-13.
- [34]李德超. 2013. 翻译批评在香港——考察香港各大报刊杂志中的翻译评论(1970—1990)[J]. 东方翻译 (2): 10-16.
- [35]李辉. 2015. 董乐山翻译《一九八四》[N]. 南方都市报 2015-07-01.
- [36]李小均. 2003. 董桥与翻译[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3): 7-11.
- [37]林本椿. 2004. 福建翻译家研究[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 [38]林以亮. 1976. 红楼梦西游记: 细评红楼梦新英译[M].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 [39]林以亮. 1990. 翻译的理论与实践[A]. 刘靖之编. 翻译论集[C].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 [40]林以亮. 2001. 文思录[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 [41]林语堂. 1990. 论翻译[A]. 刘靖之编. 翻译论集[C]. 香港: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 [42]刘荣跃. 2014. “译坛巨匠”是怎样炼成的?——杨武能教授访谈录[J]. 中国翻译 (5): 62-66.
- [43]刘绍铭. 1999. 文字岂是东西[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 [44]刘绍铭. 2001. 《中国现代小说史》再版序言[A]. 夏志清编. 中国现代小说史[C]. 刘绍铭等译.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 [45]刘绍铭. 2006. 文字不是东西[M].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 [46]刘绍铭. 2009. 文言和白话[N]. 东方早报 2009-06-21.
- [47]刘绍铭. 2014. 翻译可以“活在借来的生命”中[N]. 晶报 2014-09-14.
- [48]罗新璋. 2013. 译意发端[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 [49]孟祥春. 2014. “我只能是我自己”——葛浩文访谈[J]. 东方翻译 (3): 46-49.
- [50]穆木天. 1952. 我对翻译界三反运动的初步认识[J]. 翻译通报 (4): 6-7.
- [51]乔志高. 2000. 一言难尽: 我的双语生涯[M]. 台北: 联合文学出版社.
- [52]思果. 2001. 翻译新究[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53]思果. 2002. 译道探微[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54]思果. 2004. 推销员之死: 选评[M]. 姚克译.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55]宋以朗. 2014. 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 [56]孙晓星. 2015. 苏籍译者群里的家族译者[J]. 翻译论坛 (2): 76-82.
- [57]陶杰. 2004. 自恋红烛[M]. 香港: 皇冠出版社.
- [58]陶杰. 2012. 上等英文词典[M]. 香港: 皇冠出版社.
- [59]童元方. 2009. 选择与创造: 文学翻译论丛[M]. 香港: 牛津大学出版社.
- [60]童元方 刘忆斯. 2012. 他有三种身份 科学家 文学家 工程师[N]. 晶报 2012-06-17.
- [61]温中兰. 2010. 浙江翻译家研究[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62]夏志清. 2002. 文学的前途[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63]熊辉. 2014. 成功路上, 他始终不忘感恩——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教授访谈录[J]. 东方翻译 (5): 45-51.
- [64]修文乔. 2014. 鸳鸯蝴蝶派译者群体考察——以民初通俗小说期刊《礼拜六》为中心[J]. 东方翻译, (5): 21-27.
- [65]余光中. 1997. 余光中散文选集(三) [M].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 [66]余光中. 1998. 与王尔德拔河——《不可儿戏》译后[A]. 金圣华 黄国彬编. 困难见巧[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67]余光中. 2002. 余光中谈翻译[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 [68]余光中. 2008. 余光中跨世纪散文[M]. 陈芳明(编). 台北: 九歌出版社.
- [69]余光中. 2012. 译无全功——认识文学翻译的几个“路障”[J]. 东方翻译 (4): 59-64.
- [70]余光中. 2014. 李白与爱伦坡的时差: 余光中美学评析[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 [71]张汨 文军. 2014. 国内翻译家研究现状与流变趋势[J]. 中国外语 (4): 97-104.
- [72]张瑞娥. 2014. 赞助翻译救亡图存, 传播西学广启民智——皖籍人士百年翻译出版活动探微[J]. 中国翻译 (5): 35-39.
- [73]张宇杰. 2011. 蔡思果翻译生涯钩沉[J]. 翻译学报(香港) (1&2): 97-116.
- [74]周领顺 彭秀银. 2014. 译者群体行为研究思路——主体以江苏籍翻译家群体翻译行为研究为例[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4): 101-104.
- [75]周领顺. 2016. 译者语言与译文语言的地缘性——以苏籍译者群及其吴语运用为个案[J]. 外语教学, (1): 89-93.

has exerted strong influence far and wide. Yet a brief review shows that there has no consensu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ranslation equivalenc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ranslation studies based on discourse analysis such new terms as textual semantic equivalence and creative equivalence have been put forward. In systemic 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 term texture has been used in the literature for four decades ,but its meaning has not yet been explicitly expounded. Based on functional linguistics ,pragmatics and discourse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ulti-faceted nature of texture ,which is seen as the integration of intentionality ,selectivity ,creativity , coherence and intertextuality. It is then argued that these aspects of texture are possessed by both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and that in translation as re-instantiation the translator needs to fully play the subjective roles in pragmatic inferring ,discourse analyzing ,textual meaning constructing ,and mediat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so as to create textual semantic equivalence.

Key Words: re-instantiation; textual semantic equivalence; texture; subjective roles of the translator

Contemporary Translator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Their Language-themed and Literature-oriented Approaches Towards Translation p. 108. *JIN Qibin*

This paper focuses its study on Yu Guangzhong and other nine contemporary translators in the regions of Hong Kong and Taiwan to explore the ideals they share in translat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ir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is language-themed and literature-oriented which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ir extraordinary gifts for languages. Their approaches towards translation are characterized by their integration of classical Chinese with modern vernacular Chinese in translation ,their concern with the degener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heir aversion to translationese ,and their emphasis on translation practice instead of expounding on translation theories. Besides ,the translators held that translating literary works can help realize one's dream as a writer and spread human civilization. To fulfill these cultural missions ,they went all out and offered some translated literary works of high quality ,which set an example for young translators.

Key Words: translators in Hong Kong and Taiwan;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language-themed and literature-oriented approach

A Review of the Narratological Study of Poetry Abroad Since the 21st Century p. 120. *TAN Junqiang & FU Lichun*

Poetry narratology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direction of transgeneric narratology ,has gradually entered the field of vision of the researchers at home and abroad around the 21st century. In Europe ,United States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the research has experienced the call to it ,to explore its necessity and rationality ,until a lot of concrete researches on many aspects of it are carried out. Carding this research abroad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research situation and activities in time ,to learn some research experiences and results ,which will provide the necessary reference and help us to draw some lessons from it ,and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oetry narratology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transgeneric research; poetry narratology

